

《焦氏易林》文学研究

— 刘银昌 — 著 —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 / 曹胜高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曹胜高 主编

《焦氏易林》文学研究

——刘银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焦氏易林》文学研究 / 刘银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379 - 3

I. ①焦… II. ①刘… III. ①古体诗—诗歌研究—中国—西汉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332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文一鸥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2
字 数 379 千字
定 价 8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曹胜高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而且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成为我们的标识。这些经验和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设的历史基础和文化积淀，而且必然会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

研究古代中国，一是要以历史视角观察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更为理性地思考古代中国在国家建构、行政调适、社会整合、文化建制方面的历史经验，清晰地揭示中华文明何以如此，将之作为世界文明史的基本结论。有了准确的自我认知，便能以学术自觉推动文化自信，广泛地参与未来全球文明的共建。二是要从学理角度辨析古代中国演进的规律性特征，概括出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总结出对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作为世界秩序建设的理论支撑。有了清醒的文明定位，便能以学术自信支撑文化自信，全面主导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

这就需要当代的学术研究者，能以赓续中国学术的学脉为己任，以新的人文主义情怀面对一切历史经验、思想进程、文学创作，注重以新方法、新材料、新思路、新视野审视中国固有之学问，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推陈出新，对中国优秀文化的温故知新，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守正创新，以历时性的研究、共识性的成果，推动古代中国研究的不断深入。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编辑出版“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意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基本典籍与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重大关切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选取古代中国在文学、历史、哲学以及艺术等学科发展演

生的关键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致力于总结其“所以如此”，而且着力分析其“何以如此”，资助出版一批具有前瞻眼光、原创意识、深厚学理的研究成果。期待与同道者合作。

2015年12月8日于长安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焦氏易林》作者及成书因素研究	(7)
第一节 《焦氏易林》概貌	(7)
第二节 《焦氏易林》作者考辨	(14)
第三节 焦贲身份之确定及其思想刍议	(48)
第四节 《焦氏易林》成书诸因素研究	(64)
第二章 两汉社会中的《焦氏易林》透视	(89)
第一节 《焦氏易林》与汉代易学	(89)
第二节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及《孔子诗论》	(107)
第三节 《焦氏易林》及其文学背景	(122)
第三章 《焦氏易林》文学研究	(127)
第一节 《焦氏易林》与四言诗	(127)
第二节 《焦氏易林》集兴象之大成	(133)
第三节 《焦氏易林》之游仙诗	(156)
第四节 《焦氏易林》之咏物诗	(165)
第五节 《焦氏易林》之寓言诗	(170)
第六节 《焦氏易林》之咏史诗	(178)
第七节 “诗可以怨” ——《焦氏易林》对现实主义的继承	(187)

2 《焦氏易林》文学研究

第八节 演《易》象而言理

——《焦氏易林》之哲理诗 (207)

第四章 《焦氏易林》中的鬼神世界与民间信仰 (217)

第一节 神仙及人神沟通 (218)

第二节 《焦氏易林》的鬼魂精怪世界 (236)

第三节 《焦氏易林》所见天命观念与占卜信仰 (243)

第四节 《焦氏易林》与简牍《日书》 (264)

第五章 《焦氏易林》之影响及其文学史地位 (277)

第一节 传统视野下的《焦氏易林》接受与传播 (277)

第二节 《焦氏易林》之文学史地位 (316)

第六章 《焦氏易林》与后世签诗

——兼谈文学史的写法及对《焦氏易林》之类

作品的重视 (327)

第一节 从《焦氏易林》到签诗 (327)

第二节 文学史的写法及《焦氏易林》之类作品的重视 (340)

参考文献 (347)

后记 (356)

绪 论

文学研究是一项很复杂的活动，其研究方法和对象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文学研究的历史可谓长矣。我们以前传统的研究方法就是“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社会学伦理批评或感悟式的点评批注，这些方法无疑有它们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文学活动的复杂（尤其是文体的发展和文学接受的复杂），单一的批评模式无疑不能满足文学发展的需要，于是新时期便有了各种各样舶来的批评方法。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新批评方法的运用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和古代已大有不同，而且这些研究对象有的已经被我们的先辈研究了千百年，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还是使用以前的方法和眼光来研究这些材料，是很难有新的重大发现的。方法论的呼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语境而提出。

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方法视角，就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我们选用什么样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是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决定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

一 选题缘起

尽管我们现在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已经尝试了多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和视角还远远没有将古代文学的全部纳入本应观照的范围之内。这些被学者遗忘的角落，也都有它们自身存在的价值，有的甚至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奇异光彩和魅力。由于它们自身的原因或者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眼光，使得这些作品和作家被边缘化和作为“他者”而存在，就像山花野草一样，它们独自盛开，独自凋零，然而清香远馨，自足自本。我们现在的很多文学史，尽管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来网罗各种不同的新

资料，可是，它们向我们呈现的是否就是当时真实的文学存在？它们是否有资格来代表当时活生生的文学面貌？是否除了一些所谓的文学大师和他们的代表著作之外，就没有别的文学活动？如果有，我们应该如何来呈现这些复杂的、种类繁多的文学活动？无疑，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眼光、新的气魄、新的胸怀来面对我们的文学传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尽量真实地来反映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文学活动。

毫无疑问，那些优秀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就像一座座高山一样耸立在中国的文学地图上，给中国文学以庄严并为中国文学赢得了尊重，就像一条条大河一样滋润着中国文学的田野，成为衡量中国文学的一系列标准，并规范和制约着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方向。但是，我们知道，文学活动一开始就起源于大众之中，尽管文人阶层后来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可他们的创作源泉却大多和普通民众有关。而且，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由于某种原因，只能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流行，或者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只流传了一个短暂的阶段，后来便默默无闻了。或者，由于审美取向或传播手段的限制，使它们突然消失了，以至于后人无法知道它们真实的存在情况，一如王梵志的诗歌，但这不能代表它们不曾在社会上流传并发挥过文学审美的功能。所以，我们如果还是从单一的维度来叙述文学史，就不可能较为全面和真实地反映文学发展的原貌，也就不可能做到客观、合理。

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文学史，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种尴尬，即某一种文体或某一种文学思想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出现了停滞的现象或者“空白”，或者觉得某种文体或文学形式、手法、思想逃逸出我们的视野了。文学史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避而不谈或者给出一种自己的解释，或者是把这些阶段压缩为一个很短的章节一笔带过。事实上，在真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停滞”或“空白”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我们一说起汉代诗歌，为什么总是只会想到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除此之外就只有几位零星的成就不大（在诗歌方面）的诗人？汉代诗坛难道果真如此寂寥吗？在一个《诗经》学非常发达的朝代，这样的局面是否合理？另外，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否只是文人学士的专利，普通的大众阶层是否也有文学创作？如果有，他们的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人创作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真实关系？诸如此类问题，一般的文学史都没有关注，或者即使提到了，也只是

一些平面化的教条式论断，并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换一种视角来关注文学史、叙述文学史。

在史学研究领域，法国年鉴学派^①可谓影响甚大。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对欧洲史学是一种革命，对中国史学来讲，其影响也不可低估，并将在以后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我们以前的历史叙述，比如二十四史，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就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样的叙述无疑不能代表真实的历史。文学史属于专门史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可以借鉴年鉴学派的做法，尽可能还原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客观真实性，而不仅仅是“伟大”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谱系排列。

《焦氏易林》在我国文学史上基本上是不被关注的。作为一部占卜之书，按照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它的文辞形式与正统文学相比，是一种“异”，但是对这部非主流的、“异”的作品做一种文学研究，无疑对于丰富我们文学史的地图是有益的。而且，其作者是一位生活于底层的人文人，其风格和内容又表现出诸多民间性，所以对《焦氏易林》进行一种文学研究，可以对以上的问题做出一些回应，或许可以深化和拓展对以上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本书选题的缘起与初衷。

二 研究对象及意义

人类学中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所谓大传统，指的就是主流社会和上层社会圈子。与此相对应，小传统指的就是非主流社会和下层民间社会。参考这两个概念，笔者将文学分为大传统内的文学和小传统内的文学。与此相对应的，是雅文学与俗文学，但二者不是完全的对应关系。

本书要研究的《焦氏易林》，便是一部在小传统圈子里流传的占筮之书。它的作者是西汉时期的焦贲（当然，关于本书的作者还有一定的争议，本书的第一部分将对作者进行详细的考辨），在《汉书》当中有关于

^① 年鉴学派是法国历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派别，它得名于1929年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年鉴》，该刊物后来更名为《社会史年鉴》《社会史论丛》，1946年更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至今。该学派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费弗尔（Lucien Febvre）、布洛克（Marc Bloch）等人，他们主要的工作和口号就是对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学传统进行挑战，把研究重心从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政治史、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转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等这些形而下的、普通的东西，以至于后来专注于对小人物、小事件的研究。

他的简单记载。焦贲的弟子京房是当时的一位经学大师，主要以研究《周易》著称。汉代易学当中有一派叫做“京焦之易”，说的就是他们师徒两个在易学方面的创见。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提要》当中的说法，把《周易》引向占验一派，焦贲和京房是始作俑者。焦贲曾经做过西汉时期的小黄令，他的易学得自隐士的传承。所以，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读书人，又由于他做过低级官吏，所以他对于当时的民情是非常了解的。而他所生活的时代，西汉王朝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落。作为一位有广大悲悯胸怀的下层文人和官吏，焦贲以他敏感的触觉和过人的智慧写出了《焦氏易林》一书。这本书本来是用于算卦占卜的，它使用《周易》卦变的原理，把《周易》的六十四卦演变为四千零九十六卦，每一卦都模仿《周易》配有卦辞。这些卦辞大都是四言诗的形式，也有个别是三言的，用意大概不外乎判断吉凶。由于其为占筮书，故其占辞讲究暗示性、多义性，而为了便于记忆，又编为歌谣诗词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它同其他的卦歌签诗并无区别。关键是它的作者将它有意识地当作诗来写，作者在书中说：“作此哀诗，以告孔忧。”说的就是这种创作意识。并且，其中却也不乏优秀之作。故而，明代的钟惺在《古诗归》中收录其一些繇辞并加按语评析，闻一多先生选编《易林琼枝》，并于其后附录中将《易林》与《史记》并驾齐驱。由此可见，其文学成就被前人评价之高。

我们知道，中国的诗歌一开始是《诗经》的四言诗形式。在四言诗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五言诗。现在一般的观点认为，五言诗的起源和民间乐府诗歌有关。但是，由四言诗变为五言诗，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而现在的文学史对于汉代诗歌的演变过程却没有详细的说明，尤其是对于汉代的四言诗发展，所谈到的也只是汉初韦孟《讽谏诗》和汉末的文人四言诗如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仲长统《述志》等。这些诗歌并不能说明汉代诗歌由早期民间行为上升到文人创作的清晰过程。笔者认为，《焦氏易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就是标志着汉代诗歌从民间向文人的一个过渡状态，典型地体现了民间文学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对《焦氏易林》进行研究，可以解决汉代诗歌发展的诸多问题。在汉代的文学活动中，大部分文人在集中精力创作辞赋和实用性很强的散文，而《焦氏易林》的作者却能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潜心于诗歌的创作，这应该说

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焦氏易林》以其巨大的内容含量，和同时代的文体都有相涉，因此，研究《焦氏易林》对于更深刻地理解汉代文学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焦氏易林》还是西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情况。作为一部有鲜明创作意识的作品，焦贲用他的智慧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学遗产，后世的很多诗人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可以找到《焦氏易林》的影子。因此，闻一多先生把《焦氏易林》称作“唐宋诗的滥觞”。通过对《焦氏易林》的研究，可以对中国诗歌发展史中的一些问题有新的理解。而且，对《焦氏易林》这一著作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改变对文学研究范围的看法。文学的研究，绝不是仅仅盯在一些文学经典之上，它应该有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葛兆光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提到“思想史的写法”这一问题，该书关注小传统、从小传统来阐释思想史的做法足可为重写文学史所借鉴。比如我们以前不太重视的俗文学便属于小传统之列，文学的发展与流变如果仅从一些知名的文人及其作品上来探讨，无疑是不全面的，虽然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文人群体。由于这一点不同于思想史，我们不可能完全按葛兆光先生的思路来重写一部文学史，但小传统文学作为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学形式，是绝对不容忽视的。类似于《焦氏易林》的各种占断卦辞及签诗，其中不乏堪称为诗的佳作，正如钱锺书所说，“《易林》之作，为占卜也。诏告休咎，不必工于语言也。……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藉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鞞，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虽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①可见这些散佚民间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被写进文学史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很多类似的东西尚未被文学史家所注意。对《焦氏易林》进行文学研究，其目的也在于提供一种研究此类作品的尝试。

三 研究现状

关于《焦氏易林》的研究状况，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会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这里仅对近代以来的研究做一简单的回顾。近代最早对《焦氏易

^① 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9页。

林》进行文学研究的是闻一多先生，他曾把《焦氏易林》写进《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对《焦氏易林》的评价甚高。可惜由于先生英年早逝，使得这项研究被搁浅了。另一位值得提起的是钱锺书先生，他在《管锥编》中列专章研究《焦氏易林》的语词、句式、用象等技巧。虽然如此，《焦氏易林》仍未引起文学史家的重视，迄今为止，提到《焦氏易林》的文学史还是寥寥无几，赵义山等先生编撰的《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卞孝萱先生的《两汉文学》和赵敏俐先生的《中国诗歌通史·汉代卷》才提到了《焦氏易林》。但是，《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对《焦氏易林》的评价较有偏见，后面两书对于《焦氏易林》的评价较为公允。另外，刘松来先生的《两汉经学与文学》和张新科先生的《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作为汉代文学研究专著，对《焦氏易林》均作了精简的分析论述。目前对《焦氏易林》文学研究最为全面的是陈良运先生的《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书中对于作者的考证以及内容的分类都有很独到的看法。陈先生提出应该在中国诗歌史上给予《焦氏易林》一席之地，这种胆识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另外还有一些单篇的论文涉及《焦氏易林》，不再一一列举。从语言和易学方面对《焦氏易林》进行研究的著作还有几部，本书第五章会提到它们。

总之，对《焦氏易林》进行全面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深入，比如，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完全令人满意的《焦氏易林》注本（尚秉和先生的《焦氏易林注》主要是从易学方面入手，对于没有易学功底的人来说阅读起来很困难），这无疑限制了《焦氏易林》的传播及影响。有什么样的文学眼光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文学史。对于《焦氏易林》的研究现状说明，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尽管已有所改变，但仍然较为狭隘。近些年新传媒的发达，尤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的内涵与外延。这关系到我们如何重新认识文学，如何重写文学史的问题。

本书选《焦氏易林》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为以前不入文学史家法眼的特殊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一种尝试，并以这种解读为契机，说明在文学世界中即使小者亦有可观的道理，希望大家能够将眼光与视角“从楼阁转向地窖”。

第一章

《焦氏易林》作者及成书因素研究

研究一部专书必须要弄清楚它的作者和文本情况，对于作者有争议的著作更应该是如此。因此，本章将主要考证《焦氏易林》的作者及研究其文本形成的诸多因素。又因为很多人对于这样一部著作还不是太了解，故第一节先交代《焦氏易林》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焦氏易林》概貌

《焦氏易林》一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焦氏易林》以前主要是在小传统中流传的，就像一朵淡淡的野菊，盛开在偏僻的野外。而且，由于《焦氏易林》产生于西汉时期，文字古奥，使用典故繁多且用典方式过于简洁，无形当中就为阅读设置了许多障碍。并且，这本书从外在的形式来看，又和《周易》有很密切的关系，对《周易》的畏难心理也造成了阅读这本书的人数有限。在流传的过程中，很多江湖术士辗转传抄，又造成了该书版本不一，错讹甚多。尽管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寓目此书，可是对它却褒贬不一，大多数人只是把它看作术数之学或易学末流。故此，《焦氏易林》不登大雅之堂，难为文人雅士欣赏，影响力自然也便有限。

要了解一本著作，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它的作者。《焦氏易林》的作者在明代以后是有争议的。在明代以前，各种典籍对于该书的作者都认为是西汉时期的焦贛，有的把这部书称作《焦氏易林》，有的称之为《易林》，但至少没有怀疑作者的。可是《汉书·艺文志》却没有载录此书，以至于后人怀疑它的作者。明代以后，陆续有人对焦贛的作者地位提出了质

疑，造成了这本书的作者归属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便是传统的说法，认为焦贲是《焦氏易林》一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以后的历代正史均这么认为。一些典籍中引用此书，一般称其为《焦氏易林》，也有称作《易林》者，但均无对其作者表示异议。焦贲，名延寿（一说是字），是一位生活于西汉中后期的下层读书人，曾经做过当时的小黄县县令。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对于他的生卒年月目前还不能确切地考证出来。古人对此有些不同的说法，比如唐代的王俞在给《焦氏易林》写的一篇序言（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可信的《焦氏易林》序言）当中说焦贲是西汉元、成之世的人，元帝和成帝在位的时间段为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7年；而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焦贲生活在西汉昭帝（前86—前74）和宣帝（前73—前49）时期；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认为焦贲在西汉昭帝的时候就已经是小黄县的县令了。对此问题，近人在古人考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考证焦贲当生于汉武帝天汉、太始之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前后，卒于汉宣帝末年或汉元帝初年，即公元前48年前后。闻一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考证认为焦贲约生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约卒于汉元帝建昭四年（前35）^①。陈良运先生在《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中认为焦贲“生于武帝太始元年以后（前96），而卒年在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或稍后，活了七十岁左右”^②。当然，这些考证出的时间有的相差很近，有的则相差甚远，但都是通过间接的材料推测和判断而已。近年来，马新钦先生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焦氏易林作者版本考》中又对焦贲的生卒年月进行了考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焦延寿的生卒年史料十分匮乏，故尔我们只能暂定为：焦延寿的生年必在武帝天汉末年（前97）之前，其卒年必在宣帝元康元年（前65）以后。”^③相比较而言，马新钦先生的看法最为客观。另外，山东大学的周立升先生通过研究伪费直《焦氏易林序》（周立升先生认为此序不伪）和今本《焦氏易林》的

①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0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②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7页。

③ 马新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焦氏易林作者版本考》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焦延寿生卒年》，导师：张善文教授。

内容（主要是考察书中记载史实的年限），认为焦贛当生于公元前86年（昭帝始元元年）左右，卒于公元10年（新莽始建国二年）前后。^①照这样推算，焦贛大概活了近百岁，这不是不可能，只是缺乏实证。非常有意思的是，像顾炎武、余嘉锡、胡适等人先是通过一些文献推测了焦贛的生卒年，然后再考察今本《焦氏易林》中的某些内容反映的史实焦贛不可能知道，以此来断定今本《焦氏易林》非焦贛著。而周立升先生则先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断定今本《焦氏易林》是焦贛所著，然后再根据《焦氏易林》一书的内容来推断焦贛的生卒年。事实上这两种方法都带有先入为主的倾向，即他们的结论虽然相反，但结论推导的前提都是预设的，因此在思维方式上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焦贛的籍贯在正史中没有交代，《汉书·儒林传》和《汉书·京房传》都只是说他是当时西汉时期梁国人，至于是梁国哪个县并无说明。《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八引《陈留风俗传》中说焦贛是梁国蒙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也认为焦贛是梁国蒙人。马新钦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焦氏易林作者版本考》中也专门考证了焦贛的籍贯，赞同这种说法。我们认为焦贛为梁国蒙人是较为可靠的。蒙就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至于周立升先生相信《焦氏易林》前面一篇假冒的费直序言，认为焦贛就是建信天水人（学者对此多有疑辞，认为建信和天水相隔甚远，且年代也不相一致。关于这一点，后文关于作者考证部分有详论，此不赘述），并考证焦贛不是当时的梁国人，建新天水在今天山东东营市广饶县北。^②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从文献方面讲没有证据。根据《汉书》等文献的记载，焦贛自幼家贫，由于好学而被梁王看重，受其资助得以学习，后来做了小黄县的县令，在任期间把县内治理得非常出色，以至于路不拾遗，监狱空寂，没有盗贼。并且，由于他学识渊博，研究《周易》有得，并受到隐士的传授，他自称自己的《周易》之学来源于当时著名的易学大师孟喜，可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他还教出了汉代易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学生京房。

第二种观点认为今本《焦氏易林》的作者是崔篆。第三种观点认为

① 周立升：《焦贛易学研究》，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页。

② 同上书，第530页。

今本《焦氏易林》的作者是东汉方士许峻所著。第四种观点认为今本《焦氏易林》是东汉以后人所著。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容肇祖先生所提出的，认为《焦氏易林》“确为哀平以后的占筮书。即不然，亦当是慢慢积渐而成”^①。这些观点在本书作者考证部分会一一详细介绍。

正是由于《焦氏易林》的作者具有很大的争议，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一部伪书。可是，我们从《东观汉记》中的记载可以知道，早在东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的时候《焦氏易林》就已经被用来占卜天时了。由此可知，认为今本《焦氏易林》是东汉方士许峻所著是不成立的，因为许峻是东汉中期人，卒于公元2世纪前半叶，《焦氏易林》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至于说《焦氏易林》是东汉以后人所著，就更不可信了。我们认为《焦氏易林》的作者问题应尊重传统的说法，即作者为焦贲。

《焦氏易林》的形式非常独特，应该说它是先秦两部经典的嫁接——《周易》和《诗经》的融合，同时它又体现了巫、史文化的统一与回流。从外在形式看，《焦氏易林》一共有4096首四言（有少量三言者）押韵的像短诗一样的“林辞”（其中有重复的若干首，估计是流传过程中有的林辞散佚。后人以同书中的其他林辞补入；或者是像《周易》一样，不同的卦爻而有相同的爻辞。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在《易林》成书时代，术数文化已经颇为发达，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提要》所言：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因此《焦氏易林》为了便于民间占卜的运用，不太可能设置那么多重复的林辞），这一点应该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而且这些林辞使用、化用了《诗经》当中大量的语句或意境，广泛地使用了《诗经》所开创的赋比兴手法，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诗经》对《焦氏易林》影响甚大。但在后世的文献分类中，《焦氏易林》一般被分在术数类或易类，反映了古人对于《焦氏易林》的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焦氏易林》的编撰目的是为了社会大众的占卜决疑，虽然作者也声明这些像诗一样的林辞也有抒情言志的作用（“作此哀诗，以告孔忧”），但在文学尚未完全自觉的时代，是没有人注意它的文辞之妙的。作为一部术数类的典籍，大家注意的还主要是它的社会实用功

^① 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